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档案文献编纂学

曹喜琛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曹喜琛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排版  
丰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5.75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2次印刷  
字数: 389 000 册数: 5 001— 0 000

\*

ISBN7-300-00683-3  
G·47 定价: 6.25元

## 说 明

本书是列入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材编选计划中的一种新编教材。它主要供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作为教材使用，同时对广大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吸取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新鲜经验和批判地继承、挖掘历史遗产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由导论和14章组成。导论和第1、2、5章，由曹喜琛执笔；第3、9、14章，由韩宝华执笔；第4、10、12、13章，由刘耿生执笔；第6、7、8、11章，由耿建军执笔。本书由曹喜琛负主编责任。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道宏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书中借鉴了档案界、史学界的专家和同行的研究成果，谨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1989年10月1日

#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略	8
第一节 “六经”与孔子的编纂思想	8
第二节 刘向、刘歆对古代文献的整理	12
第三节 刘知几的史料编纂实践与思想	14
第四节 《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	18
第五节 章学诚的史料编纂思想	25
第六节 中华民国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	33
第七节 新中国建立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	39
第二章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概述	44
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44
第二节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作用	59
第三节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和基本原则	71
第三章 编纂题目的选定	81
第一节 编纂题目的内容范围	81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出版形式	92
第三节 编纂选题的优化与决策	112
第四节 题名拟定和编前研究	119
第四章 档案文献的查找	129
第一节 查找档案文献的意义和原则	129
第二节 查找档案文献的方法	134
第五章 档案文献的挑选	163

第一节	选材的意义 .....	163
第二节	挑选—分析档案文献的原则 .....	164
第三节	选材的基本要求 .....	171
第四节	选材的方法与步骤 .....	189
第五节	档案文献的选本 .....	192
第六章	档案文献的考订 .....	201
第一节	文献赝品与考据辨伪的历史 .....	202
第二节	鉴别档案文献真伪的方法 .....	211
第三节	档案文献形成时间的判定 .....	232
第七章	档案文献的转录加工 .....	238
第一节	档案文献加工工作概述 .....	238
第二节	档案文献原文的转录与删节 .....	247
第三节	档案文献行款格式的处理 .....	256
第四节	档案文献标记批语的处理 .....	261
第五节	档案文献的影印出版及其转录加工 .....	264
第八章	档案文献的点校加工 .....	269
第一节	档案文献的校勘 .....	269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标点与分段 .....	287
第九章	档案文献的标题 .....	301
第一节	档案文献标题的作用及拟制要求 .....	301
第二节	档案文献标题的成分及其标法 .....	304
第三节	档案文献标题的类型及其结构 .....	318
第十章	档案文献的编排 .....	336
第一节	汇编的体例 .....	336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分类排列 .....	346
第十一章	汇编评述性材料的编写 .....	356
第一节	注释 .....	356
第二节	接语 .....	389

第三节	序言 .....	400
第十二章	汇编查考性材料的编制 .....	415
第一节	年表 .....	415
第二节	插图 .....	430
第三节	备考 .....	435
第四节	编辑说明 .....	441
第十三章	汇编检索性材料的编制 .....	446
第一节	目录 .....	446
第二节	索引 .....	454
第十四章	档案文献的出版 .....	473
第一节	底稿审核 .....	473
第二节	装帧设计 .....	479
第三节	校样校对 .....	487

# 导 论

## 一、文献的含义和档案文献的特点

档案文献是档案文献编纂的客体，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必须弄清楚档案文献这个概念；而档案文献又是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首先要明了什么是文献。据古今学者考查，在我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文献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sup>①</sup>孔子在这里采用了文献这一概念，其中也包含着他对文献作用的认识，即缺乏文献不足以证实历史。在我国典籍中，最早对文献作出解释的，当推东汉学者郑玄，他为《论语》作注说：“献，贤也。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到了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文献的解释更为简洁、明确。他在为《论语》作的注解中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按：贤，指贤人、贤材，有人引申为熟悉掌故的人所讲的话、发表的议论，记录下来，称为献。）此后，元人马端临在其编纂的《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一番叙述，基本上沿用了朱熹的解释，并有所发挥。他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

---

<sup>①</sup> 《论语·八佾》。



者，则不能书之，所谓献也。”显然，他把书面记载称为文，把学士名流的议论称为献，即所谓“叙事为文，论事为献”。从《文献通考》的编纂形式也可以证实马端临对文和献是严格区别的：凡叙某事，顶格书写的，都是书本记载；凡论某事，则低一格书写，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直至清代，对文献的解释大体仍沿用宋、元学者的上述看法，与之大同小异。如清人杨宾在其《柳边纪略》自序中写道：“中原土地之入郡县者，山川方域，物产风俗，皆有文以书之，书而不能尽，与所不及书者，则征之逸民逸老，所谓献也。”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古人认为：第一，文和献是有不同含义的，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面记录，献则是后人对历史上某事所发的议论、追忆的记录；第二，文和献的共同点是同为文字材料，都有印证史实的作用。

虽然文献的含义在古代还是比较统一的，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现代，人们对文献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文献作出的各种解释。例如，情报学强调文献是“知识的结晶，情报的主要来源”；图书馆学则称文献为“一切知识的载体”；从资料工作的角度，文献又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对象。至于谈到文献的具体范围，更是众说纷纭：有人从材料的重要程度出发，认为凡重要者可视为文献，非重要者不得用文献之名；有人从材料的性质出发，认为凡正面材料可归文献之列，反面材料不得列入文献之林；有人则把文献的范围推及得更广，认为它应当包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迹、古物等实物史料。时至今日，有关文献概念的讨论和争议，仍在进行之中。

为了保证文献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进而实现其统一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从1979年开始制订有关文献工作术语的国家标准，至1983年1月29日由国家标准局批准

公布，这就是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在这个标准中，“文献”被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个定义参照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6）1982年制订的ISO/DIS5127《文献工作术语》国际标准以及ISO2382《数据处理用术语》国际标准，同时还参照了美国、联邦德国、苏联等国的国家标准。因此，这是一个现代广义的文献术语概念。

根据这一标准定义，文献概念的外延相当宽泛，它应该包括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如普通图书、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古籍、档案、地图、乐谱等各种类型的文字材料，同时也包括一部分实物资料。因此有人说：“文献不但包括现代图书馆全部馆藏，也包括了档案馆、博物馆、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sup>①</sup>

规定并采用现代广义的文献概念，是当今文献工作发展的需要，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使得文献工作更便于现代化管理。例如根据这一现代广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便可以对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按形成的历史时期分，有古籍文献、现代文献；按加工程度分，有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按记录形式分，有手抄文献、印刷文献、声像文献、缩微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机读文献；按信息接受方式分，有视觉文献、听觉文献、触觉文献；按不同物理形态分，有一维文献（光磁线性记录文献）、二维文献（书面及缩微文献）、三维文献（文物及博物馆文献）；按出版形式分，有普通图书、连续出版物、地图、图片、乐谱，等等。<sup>②</sup>上述文献的不同分类，为文献的科学管理及自动化检索提供了便利条件。

---

① 朱南：《现代广义文献术语概念浅说》，载《文献》1987年第2期。

② 同上。

作为现代广义文献概念的国家标准定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约束力。在涉及到国家标准所规定的文献工作范围时，应该按照标准定义来理解和执行，以免造成文献工作的混乱。但是，国家标准定义并不能从学术上完全统一人们的认识，解决有关文献概念的学术争端。事实上，尽管国家标准定义早在数年前就公布实施了，并且逐渐被全国图书、情报和档案界所接受，然而人们围绕文献概念所展开的讨论和争议，却始终持续未断，有时还比较激烈。列宁说过：“……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sup>①</sup>因此，人们对文献概念的理解至今还不能统一，并不足怪。大量事实早已证明，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术语，大都与历史传统、文化特点、民族习惯、学术流派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种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即使订出标准，也不易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况且，对某些术语有不同认识，不仅在学术上是允许的，而且也有利于标准的进一步修订和不断完善。

当前在解释文献概念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文献究竟包括不包括文物资料。一种观点认为，文献不仅指各种文字材料，同时也包括文物资料、起码是部分文物资料在内；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文物资料不在文献之列。张舜徽先生持后一种观点，他指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缙帛上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7页。

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sup>①</sup>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不少人所赞同。

了解文献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当今人们的不同认识，有助于理解档案文献这一概念。档案文献既属于文献之一种，就具备一般文献所共有的性质。但它也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文献的个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它具有原始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手材料；第二，它具有权威性，与其他文献比较，它具有或曾经具有法律效力，在一事有不同记载的情况下，一般以档案的记载为准，它的凭证作用较其他文献更为可靠。

档案文献编纂学着重研究档案文献的编纂原则与方法，同时也必然要应用到一般文献编纂的原理和原则，在编纂实践中，有些原理和原则是档案文献与其他文献所并用的，因此，我们这里使用档案文献这个概念具有双关的意义。

## 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科目，它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档案文献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依据和条件，但是，档案文献的客观状况同人们的利用要求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因而解决档案史料的浩繁、芜杂和副本的有限性同人们利用要求的专题性、科学性和广泛性之间的矛盾，便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探讨解决这种矛盾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学问，便构成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

---

<sup>①</sup>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4页。

编纂题目的选定，档案文献的查找、选择、考订和选本，档案文献的加工、标点、标题和编排，档案文献的评述性材料——注释、按语、序言的编写，档案文献查考性材料——年表、插图、备考、凡例的编制，档案文献检索性材料——目录、索引的编制，档案文献出版物的校对和技术设计。有关上述内容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便组成本门学科的科学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总结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现实经验和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揭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规律，确立和不断完善它的理论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档案文献的利用需求，是本门学科的根本任务。

具有中国特点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依其性质应遵循下述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一，档案文献编纂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研究本门学科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档案文献是一种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的属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项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的资料工作，这就决定了研究本门学科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它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历史观点分析并评述档案史料的价值和公布史料的意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和阐述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决编纂工作中各项理论的、实际的问题。

第二，档案文献编纂学属于应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是本门学科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在着重研究和总结中国现实的特别是各级档案馆（室）的编纂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要认真吸取历史的、档案馆（室）以外有关部门的编纂工作经验，还应当注意批判地吸取外国的有益的经验。在研究中不但要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也要注意深入探讨具体的技术

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第三，档案文献编纂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的关系，借鉴历史学特别是史科学的理论和动态和情报，对本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文献学、目录学、情报学、考据学、版本文字学、文书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科的必要条件。

## 第一章 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略

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源远流长，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算起，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历代相因、不断发展，其规模之巨大、成果之繁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在我国古代乃至近代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门著述，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科目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形成。但是，历史上的文献编纂活动及其积累的大量成果，都凝聚着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丰富的原始素材。有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在文献整理编纂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把对目录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与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是丰富和发展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必要条件。

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学史这一领域，我们还没有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现就管见所及，略述其梗概，以见一斑。

### 第一节 “六经”与孔子的编纂思想

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萌芽渊源于档案文献编纂的最初实践。在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文献编纂活动是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六经”中的《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典型的档

案文献汇编。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他以周公自命,反对社会改革,企图恢复日益没落的奴隶制,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然而到处碰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sup>①</sup>。由于自己的主张不能见用于诸侯,孔子遂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sup>②</sup>。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转而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以追记“三代之礼”<sup>③</sup>,并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以“六经”为教本,传播其思想,以达其“拨乱世反之正”<sup>④</sup>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一目的不可能实现,然而孔子的这些活动一方面普及了教育,打破了当时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另一方面也整理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使之得以流传下来。孔子不愧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文献整理编纂家,他在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上占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六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sup>⑤</sup>又说:“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政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而无所作。”<sup>⑥</sup>他还进一步明确地说:“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sup>⑦</sup>龚自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史记·孔子世家》。

⑤ 《文史通义·易教上》。

⑥ 《校讎通义·汉志六艺》。

⑦ 《校讎通义·原道第一》。



珍也说过：“六经者，国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sup>①</sup>可见，“六经”是孔子对“先王之陈迹”加以整理编纂的“比次之书”，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史料书”、“史料汇编”之类的东西。所谓“非孔氏之书”、“非孔子所作”，即是说它们不是孔子的著作。因为孔子编订《六经》基本上属于史料的编纂工作，而不属于史书的撰写工作。具体地说，《易》是讲卜筮的，其中有一些哲学思想，属于哲学史料；《诗》是春秋以前平民与贵族的诗歌总集，不仅是文学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殷周的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书》是档案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虞、夏、商、周几个时代的档案史料；《礼》是古代典章制度的汇编；《春秋》是据鲁史取材编纂的大事记。总之，基本上都属于史料汇编的性质。

关于孔子编订“六经”所遵循的原则，范文澜同志曾提出过较为系统的看法，认为孔子有三个准绳：

第一，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这是孔子编纂历史文献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sup>②</sup>。他编订“六经”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故国文献，“先王之陈迹”。《诗》、《书》、《礼》、《易》，大都是档案文献的汇编，《春秋》虽属编述性的作品，但基本上是依时序排比史实，属于大事记的性质，它们都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文字。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是说，他认为把事实照录下来，要比自己空发议论深切明白得多。正因为如此，“六经”才

---

① 《古史勾沉论》。

② 《论语·述而》。